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 总主编：陈 琪 陈 波

苏 共



组织制度的衍变

The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刘国华◎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总主编：陈琪 陈波

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项目（项目编号：10XJC770008）

苏 共



组织制度的衍变

The Evolution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刘国华◎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共组织制度的衍变 / 刘国华著 . — 广州 : 世界图书
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2015.6

ISBN 978-7-5100-9779-9

I . ① 苏… II . ① 刘… III . ① 苏联共产党—党
史—研究 IV . ① D35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3622 号

苏共组织制度的衍变

责任编辑 冯彦庄 孔令钢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http://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80 千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9779-9/K · 0290

定 价 66.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总序

2014年伊始，世界政治就被层出不穷的冲突和纠纷所困扰，亦显示出变化的曙光。一方面，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围绕克里米亚的角力，隐隐然让世人看到传统冷战思维的回潮；另一方面，包围在马航 MH370 航班失联事件的疑团，凸显了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与困难度。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公认价值的今天，很多老问题尚待解决，不少新问题也应运而生。面对略显纷乱嘈杂的现实，古老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首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全球治理的概念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一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更加明显。在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环境保护、疾病预防以及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都要将全球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体系来解决问题，政治学者需要及时提出有效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其次，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既要对外面对国家间冲突、政经纠纷等问题，也要对内面对因贫富差距拉大、扁平化社会所带来的诸多矛盾。这些理论及操作层面的疑问，都亟需学者从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视角给出相应的答案。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是对正走在“圆梦之路”上的中国自身的突出贡献。其一，正在崛起的中国，对内正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深水区”，学者需要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缓解社会矛盾提供更多的政治智慧。其二，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提升，伴随而来的外面环境压力也在逐渐增强。如何妥善解决包括海洋争端和贸易摩擦在内的国际议题，如何为已经秉承了近三十年的“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注入新的内涵，是理论界必须承担的责任。其三，中国怎样更好地履行负责任大国的职责，并更好地向全世界传达属于自己的政策主张乃至价值取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前瞻性课题。

重新聚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术界自身发展的诉求。政治学是一个古老的学科，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则是一个肇始于 19 世纪末，

繁荣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新局面。学者们目前的工作，不仅是要积极追赶和呼应西方政治学科的发展前沿，提高我国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也要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治理的丰富养分，扎根于目前的政治现实，缔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适用价值的理论观点。对国际关系学科而言，国内学界在学科建设、研究方法和运用研究资料等方面，也存在着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压力。在目前国际关系学科内范式融合和全球治理理念盛行的背景下，国内学者需要在思想创新和议题选择上做出更多努力。

当然，一个学科的发展和壮大，绝不能仅仅依赖于学者个人或者群体的努力，更需要有蓬勃向上的国力和理性有序的社会氛围作为支撑，需要来自于政府、高校、非政府组织乃至公司企业的资源倾斜。与此同时，学者也有责任将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的成果，以及自身所具有的文化视角和国际视野，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即所谓智库的作用。目前，智库在中国的发展尚属方兴未艾，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同仁加入其中，群策群力间实现本学科的跨越式发展，一同积极面对现实，踏实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的目的与意义，为了向国内外学者与公众展示和分享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精心策划和推出了《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智库丛书》。我们期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收集和推出一批高质量的兼具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专著、译著、论文集等，展现本学科学者们笃学省思的风采。在此，也拜求学界各同道先进，不吝赐稿，共襄盛举。

最后，该丛书的顺利出版有赖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武汉学术出版中心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的大力支持，有赖有关部门的关心与指导，有赖学界同仁们的关注与帮助，更有赖广大读者、学人的阅评和指教。本人在此一并致上诚挚的谢意！

陈 琪 陈 波

2014 年 3 月 28 日

（陈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秘书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科学》执行主编；陈波，“冲突管理、和平经济与和平科学”常设国际学术会议中方主席，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Economics and Peace Science* 共同主编）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列宁时代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制度的缘起与初创	017
第一节 从集中制到民主的集中制：新型党建模式的探索	017
第二节 列宁集中制思想的俄国根	034
第三节 列宁民主的集中制理论的五个思想来源	042
第四节 革命与战争时期“民主的集中制”的实际运行	053
第五节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民主的集中制的反思与修正	074
第二章 斯大林时代联共（布）组织制度的确立与扭曲	110
第一节 斯大林的“民主的集中制”理论	111
第二节 斯大林党建模式的确立与定型	124
第三节 斯大林版本“民主的集中制”的扭曲形态	152
第四节 斯大林扭曲的“民主的集中制”的后果与影响	172
第三章 赫鲁晓夫时代苏共组织制度的调整与错位	193
第一节 改革突破口：反对个人崇拜	193
第二节 苏共组织制度的调整	207
第三节 苏共组织制度改革的错位	218

第四章 勃列日涅夫时代苏共组织制度的固化与变形	233
第一节 “稳定”主题下对苏共组织制度的微调	233
第二节 苏共传统组织制度的固化	244
第三节 苏共组织制度的变形	253
第五章 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组织制度的变革与幻灭	266
第一节 苏共组织制度的变革：从改革到“根本革新”	267
第二节 苏共组织制度的蜕化	276
第三节 苏共组织制度变革的幻灭	289
第六章 苏共组织制度衍变的镜鉴	306
第一节 苏共组织制度衍变的回顾	306
第二节 苏共组织制度衍变的启示	319
结 语	329
参考文献	331
后 记	343

导 论

一、选题意义

20 世纪苏共^[1]、苏联的兴与亡都堪称“历史之谜”，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苏共瓦解、苏联解体二十多年来，国内外政学两届对其原因的解釋虽已取得了不少共识，但仍存在较大分歧，对许多基本问题还是众说纷纭，代表性的说法多达二十余种，比如：三大垄断说、体制僵化说、群众抛弃说、腐败亡党说、斯大林模式说、背叛马列说、和平演变说、改革失败说、经济没有搞好说、民族矛盾说、军备竞赛说、蜕化变质说、合法性流失说、舆论失控说、意识形态衰落说、民主缺失说、病态早产说等。这种“说”那种“论”各有侧重，从不同视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尝试揭开这一“历史之谜”的冰山一角，无疑都有着合理性和建设性的一面，它们本不应互相排斥，把各种“说”和“论”综合起来，就是最有说服力也最简单的“历史合力说”。即恩格斯所说的，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变的发生，都“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2]。也就是说，苏共执政 70 余年积累起来的种种弊端，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和失误，共同造就了这段历史。苏共的失败，体现了各种因素相互间形成合力的作用。对于

[1] “苏共”在历史上曾数易其名。1898 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1903 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1912 年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布拉格会议）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正式独立；1918 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将党名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 年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将党名改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 年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本书在统称时，采用的是“苏联共产党”的简称“苏共”这一概念，而在每一章的具体行文中，采用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78 页。

苏共瓦解、苏联解体是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一“常识”人们似乎都是接受和赞成的，但目前的分歧在于在诸多“合力”中何种“力”是主导性因素或根本性原因，由此形成了四种不同的“学派”，即激进自由主义派、原教旨社会主义派、苏共蜕化派和体制僵化派。

对于这四派的观点，笔者基本赞同肖枫先生的态度^[1]。对“激进自由主义”和“原教旨社会主义”这两种“极端化”观点，我们在原则上应旗帜鲜明地予以摒弃。前者（以布热津斯基、弗兰西斯·福山等人为代表）站在自由派的立场将苏联解体归结到“十月革命”头上，似乎“十月革命”根本就不该搞，从根本上就错了^[2]，他们认为“以苏联名义所建立的共产主义集权制度”政治上是一种“官僚化等级制统治整个社会”的“有罪和残暴”的大规模谋杀制度；经济上“无法提出一种切实可行的社会经济的替代办法来取代自由市场制度”致使“经济不振和最终制度上的运作不灵”；更由于“道德上的肆无忌惮”，“摧毁了人的精神”，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敲响了共产主义的历史性丧钟”。^[3]后者（以尼娜·安德烈耶娃为首的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和科索拉波夫等学者为代表）将苏共瓦解的原因归于戈尔巴乔夫等人背弃了斯大林路线，主张回到斯大林那种社会主义上去。^[4]毋庸置疑，这两种极端化的基本观点都是错误的，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也与真正的历史主义相去甚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便这些我们谓之观点错误的内容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关于苏共、苏联和传统社会主义诸多问题的指责或捍卫并非完全无中生有，事实上在他们的论证中也不时会有一些闪光点，而这些有用的成分对我们正确的诊断和治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我们应该有宽广的胸怀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善于从不同的渠道、从不同的人物乃至对手那里借鉴、学习，善于从一大堆无用的砂砾中去寻觅和筛选金子，化腐朽为神奇，化批评为动力，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唯其如此，方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1] 参见肖枫：《苏联解体我的解读——一个国家的崩溃，如何看，怎么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前言”第7页。

[2] 参见戈尔巴乔夫等主编：《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2页；《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写在“十月革命”90周年之时》，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3] [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67、68页。

[4] 参见李兴耕等：《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的创造性发展。如此既践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自信。

至于苏共蜕化派和体制僵化派，则本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内的两种“不同”观点的派别，只不过一派强调“根本原因”在领导人的背叛，在执政党的蜕化变质；另一派强调“根本原因”在体制、在斯大林模式。苏共蜕化派的代表性著作是2011年3月出版的李慎明同志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该书强调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1]。体制僵化派的代表性著作是2010年10月出版的由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等主编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该书的核心内容如阎明复同志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抓住了这一“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2]

毋庸置疑，苏共蜕化派和体制僵化派这两派貌似差异很大的结论其实都有其合理性，且都能在《邓小平文选》中找到相关论据。一方面，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执政党，它要出问题，当然是全局性和致命性的，正所谓“成也在党，败也在党”，党是一切问题的总根源。苏联解体的进程表明，最直接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将“改革”变成“改向”，以致苏共陷入了全面而深刻的危机，党不仅遭到民众唾弃，而且连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也没有了。这样的党没法不亡。吸取苏共教训，邓小平强调“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3]，可谓掷地有声，字字珠玑。另一方面，制度体制问题也是全局性根本性的。按邓小平的说法，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体制和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4]但问题在于苏共蜕化派和体制僵化派的相互敌

[1] 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2] 陆南泉等：《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序一”，第1—2页。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381页。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视又给人一种剑走偏锋、画地为牢的感觉。双方所强调的无论是执政党自身的问题还是制度体制性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苏共崩溃、苏联解体中最主要的问题，都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两者是可以同时兼容的，而不是相互排斥和根本对立的，大可不必赞成前者就否定后者或者赞成后者就否定前者。所以两派应捐弃前嫌，祛除成见，平等对话，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去伪存真，精诚合作，凝聚共识，而不是像目前这样各执一端，自说自话，相互对立下去。因为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根本性”问题未必只能有一个，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不同角度与不同层面，可有不同的“根本性”问题。双方如能真正坚持“合力论”，真正承认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多重因素”，真正从整体上把握、统筹兼顾，就不应当否定对方问题的根本性，现在两派的许多分歧是完全可以讨论和交流取得一致的。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悲剧之所以发生，关键在内因，在共产党。诚如江泽民所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东之所以发生剧变，“除了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和国际敌对势力长期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等原因外，关键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危机时刻党内在政治上发生重大分歧，导致政治局面一发不可收拾”。^[1]因为苏共是苏联社会的政治主轴，是整个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败就败在它没有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应有的体现，败就败在领导这个社会的党由一个充满活力的、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的党，渐变成了一个失去活力、群众对之离心离德的党，并逐步丧失了领导国家和社会前进的能力，难以担负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使命。而苏共之所以变得不给力、不够格，原因当然众多，其中组织结构与制度的扭曲和僵化不啻是苏共整体变质的深层次根源，而党一国精英的集体性蜕变则是导致苏共变质的直接原因。正是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的党一国精英的蜕变激发了潜伏的体制因素矛盾的总爆发，遂导致亡党亡国亡制的世纪性大悲剧的发生。二者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合力剿杀了苏共，至于二者孰轻孰重则是剪不断、理还乱，恰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类非一般智力所能分辨、考究得了的。当然，如此说并不是为了替戈尔巴乔夫等人开脱罪责。毋庸置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是苏共和苏联大厦坍塌的推手，虽然他们所担任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正是他们合力将党和国家引向了覆灭的不归路。

[1]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页。

所以,从法理的角度来讲,他们作为苏共瓦解和苏联解体的第一责任人是不容推卸的。只是法理责任并不能成为排斥和否定苏共制度问题根本性的理由。在此可以回顾一下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对1848年革命失败的总结,他指出:“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能说明任何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人出卖自己。”^[1]所以,“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2]换言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领导人的蜕变也应从制度体制上去寻找根源。毕竟,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雅科夫列夫之流,都是苏共体制的产物,一大批异己分子之所以能涌入苏共并挤进权力核心从内部去攻破堡垒,恰好说明“苏共”这个组织已然沉疴在身,其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早已发生了扭曲与畸变。

概言之,历史性的深层次体制问题与现实性的苏共集体性蜕化变质尤其是领导者的无能和背叛合力剿杀了苏共和苏联。其中,苏共是总根源,体制问题是总病灶,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割裂不开的。因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2]。只是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所以应当从复杂性、多样性上去深刻认识苏共的问题。孰知,苏共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几乎在党的建设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找到导致苏共失败的因素。故要避免先入为主,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倾向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而要特别注意原因的多层次性。当然,就党的制度构成而言,组织制度无疑是其最核心、最重要的内容,毕竟苏共首先是作为一个组织而存在的。

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很流行,即认为苏共失败就是因为这个党在党的建设中放弃了民主集中制。乍听起来,不无道理:一个政党,如果只有集中,缺乏民主(如20世纪80年代改革前的苏共),就没有活力;如果只有民主,缺乏集中(比如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的苏共),就是一盘散沙。但细加推敲,就能发现其中存在不少历史与逻辑的错误,孰知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绝大多数政党都不主张民主集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2] 陆南泉等:《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序一”,第1—2页。

中制，甚至有些原本主张和拥护民主集中制后来却反对、放弃民主集中制的党（如法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而崩溃；相反，倒是那些一遍又一遍声称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党，总是在不断地出毛病，而且毛病都十分相似：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历史已经证明，要克服原来的弊端，简单地放弃民主集中制肯定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放弃民主集中制，也很难令人信服地说明问题。^[1]事实上，那种将民主集中制视为无产阶级政党唯一正确的组织原则的做法既与历史事实不符，在逻辑上也说不通。一则大量的证据显示，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原则是民主制，而不是民主集中制，二则俄共（布）“十大”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说得非常明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认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适合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相反，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2]即是说，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并不具有必然性和普适性价值，它之所以会被各国共产党所普遍采用，根源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适宜性问题。苏共将民主集中制作为自己的组织原则既然是历史的产物，那么它自然会经历一个从兴到亡的历史进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即便苏共放弃民主集中制，也不意味着苏共必然会瓦解。

关于民主集中制与苏共的瓦解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相关性这一问题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江泽民曾经说过：“邓小平同志总结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教训，曾经告诫我们，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很重要，要结合新的实际，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好好论一论。”毕竟，“苏共从党章中取消民主集中制后，党也就四分五裂了”^[3]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它充分说明苏共所实行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与苏共的存亡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关联度。众所周知，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等人将“改革”变成了“改向”，但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于戈尔巴乔夫等少数领导人的背叛，而在于苏共的体制在党一国精英叛卖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无力。一个拥有1900多万党员的大党在党一国精英明显将党和国家引向错误方向之时却表现得如此无能为力或无动于衷，着实让人惊讶。问题的根源

[1] 参见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2]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50页。

[3]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8页。

在哪里呢？对此，邓小平一语中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1]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等人之所以将“改革”变成了“改向”，其根源就在于苏共的组织制度未能提供可靠的保证。那么，这是否就等于说苏共失败就是因为它们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呢？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虽然这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也能找到许多“现象级”的事实作为支撑论据，但它没有办法回答如下诘问：为什么一个长期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政党就同意放弃民主集中制呢？如果说仅仅是由少数上层领导的背叛所致，那么人数众多的党员又怎么能够坐视少数叛徒取消民主集中制、将党一国引向歧途而不闻不问、无声无息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苏共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本身在苏共决定放弃它之前已经出了大问题，进而导致民主集中制治理下的苏共党本身发生了异化。由于长期实行的所谓“唯一正确”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根本无法或无力保证广大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制约权，所以在广大党员眼里，党俨然已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事实上，正是普通党员心中的“他们”——党一国精英的集体性背叛即所谓“来自上层的革命”^[2]催生和加速了苏共的瓦解。对此，有学者指出：苏共“亡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诸多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在众多因素中，党的组织制度的衰败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苏共制定的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建立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根源在于高度集权的党内组织制度”^[3]。这里所谓苏共组织制度的衰败，其最主要的体现便是由苏共民主集中制“名”“实”不符所带来的一系列衍生问题。这是本书所力图揭示的一个奥秘。

至于有的学者担心由于中苏的特殊姻亲关系，说苏共、说苏联就是在说我们自己，对苏共、苏联制度体制的批评和否定会影响到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其实，这有点杞人忧天：一则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是逐渐流失的，苏共瓦解是历史上各种矛盾未能得到及时妥善处理而长期积累并集中爆发的结果；二则虽然中共、中国的体制是从苏共、苏联传承而来，但经过30多年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共、中国的体制与当年苏共、苏联的体制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所谓的影射，我们要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充分自信。下面仅以苏共和中共的“民主集中制”为例，可窥一斑。传统上，我们一直认为苏共的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但苏共的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2] [美]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王立新：《苏共兴亡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组织制度，在俄语中一直用的是“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ализм”，俄文的原意是“民主的集中制”，只是我们在翻译成中文时却将“的”省略掉了，从而导致了理论阐释和实践操作上的一系列偏差。综观苏共对“民主的集中制”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苏共是从三个方面使用这一概念的：一是共产党组织原则意义上的民主的集中制；二是国家结构意义上的民主的集中制；三是经济管理层面的民主的集中制。但不管是在哪一层面使用这一概念，它的基本内容都是着眼于服从组织的纪律和维护组织统一，至于扩大民主、实行集体管理等理论架构和实践操作中都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苏共的“民主的集中制”是一个偏正结构，“民主的”只是作为“集中制”的限定词，“集中制”才是它的本质，或者说苏共的“民主的集中制”是隶属于“集中制”的，是从“集中制”中分析出来的，是“集中制”中相较于“专制的集中制”而言比较“民主的”的一种类型而已。而中共对民主集中制的经典解释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与集中是并列平行关系，是“民主制”与“集中制”综合而成的，民主与集中是“辩证统一”的。可以说，苏共的“民主的集中制”与中共的“民主集中制”虽然在文字上只有一字之差，但在本质上却有着天壤之别，与苏共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相比，中共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更富有弹性、平衡性与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造就苏共走向僵化乃至败亡而中共却能渡过危机至今仍充满生机的奥妙所在。可以说，在列宁之后，苏共从未真正实行过中国共产党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当然，这样说并非要排除中共“民主集中制”与苏共“民主的集中制”之间的渊源关系，而只是要说明中共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虽来源于苏共，但并没有停留于此，而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道，实现了对它的扬弃、超越与更新。所以我们在对有关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研究的时候，“首要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你说的是哪个版本的民主集中制”。^[1]

总之，苏共的组织制度是苏共的命脉所在。本书力图从组织的视角来透视苏共，通过对苏共组织制度衍变历程的梳理，探究它与苏共的兴衰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内在的联动关系。这就是本书的主旨所在。当然，本书将重点放在探讨苏共组织制度的衍变与苏共的兴衰之间的关系上，认为它是解开苏共兴衰的一把密匙，但绝非主张解开苏共兴衰的钥匙仅此一把，只是提供一个研究视角，探索其内在机理，汲取历史智慧，以史为鉴而已。

[1] 郭文、刘国华：《民主集中制溯源考》，载《求实》2012年第12期。

二、国内外研究概述

关于苏共组织制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是个老话题,各国学者站在不同的立场有过不同的评述,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绝大多数著作和论文都将焦点集中于民主集中制上,如英国学者米歇尔·沃勒的《民主集中制——一个历史的评价》^[1]、美国学者罗纳尔德·迪耶尔斯基的《斯大林模式:民主集中制与共产主义政治发展问题》^[2]和我国学者张慕良的《列宁民主集中制奥秘初探》(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范进学等的《民主集中制宪法原则研究》(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武三中的《变革时代民主集中制问题研究——兼论作为制度系统的民主集中制》(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苗佳瑛的《民主集中制研究》(同心出版社2009年版)、韩光宇的《民主集中制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牛安生的《党的民主集中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顾建键等的《民主集中制建设论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贵秀的《论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编写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与实践》(党建读物出版社1994年版)和总参政治部组织部编的《民主集中制论要》(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等便是个中代表。当然,这些著作在重点关注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实质与制度机制的同时,也大多勾勒了民主集中制概念、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当然,在探讨苏共瓦解、苏联解体之谜的过程中,李慎明、徐天新、王立新等都将苏共在组织上的蜕化与变质、民主集中制的变形视为一大诱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燕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对苏共基层组织的发展演变历程做了重点探讨。但总体而言,国内外对苏共组织制度衍变本身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全面性,显得比较笼统和模糊,而且在很多问题上都异见纷呈,分歧颇大。现有成果的主要研究视角如下:

1. 苏共组织制度的实质

学术界普遍认为苏共的组织原则和基本组织制度是民主集中制,但对民主集中制的定性分歧却很大,如西方的“列宁学家”沃尔夫、流落西方的苏联学者阿夫托尔汉诺夫等认为苏共的民主仅是一个幻想而已,苏共组织制度的实质是极端集中主

[1] Michael Waller: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 historical commenta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2] Ronald Tiersky: *Ordinary Stalinism: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the Question of Communist Political Development*, Bost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5.

义；而在原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苏共所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民主”，它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只有少数学者如苏联的奥伊泽尔曼及我国的高放、王贵秀、尹彦、郑异凡等提出异议，认为苏共实行的是“民主的集中制”，其核心在“集中制”。

2. 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苏（俄）共领导层是否践行了民主集中制思想

苏联和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列宁当政时期很好地遵守和实践了民主集中制，后来这一原则之所以遭到破坏并非是列宁的过错，而是列宁的继承者斯大林等人片面发展了集中制所致；只有 A·齐普科和高放等少数学者认为列宁时期民主集中制原则虽被普遍确认，却在实际运作中被忽视或抛弃，这一结果主要是列宁的失误，苏共组织制度的先天不足构成了其后发生扭曲变形的制度根源；尹彦提出与新经济政策相对应的是，列宁晚年提出了“新政治政策”，党的组织制度的重心已转向民主制；高放、郑异凡和管怀伦等人对列宁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和基本制度的缘起与衍变进行了历史考证，指出民主集中制并非共产党天然的组织原则，俄共（布）“十大”提出了“工人民主制”的组织原则，只可惜由于列宁的生病和早逝等原因，这一原则未能实施，实在是国际共运的一大憾事。西方相当多的学者把列宁视为一位专制主义者，但也有例外，如罗伯特·丹尼尔斯就认为列宁时期是一个“伟大的党内民主时代”。

3. 苏共组织制度的历史作用

阿夫托尔汉诺夫、布热津斯基等西方人士对苏共的民主集中制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认为苏共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是造成其奉行“党治制”、专制集权的“万恶之源”，乃至是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原罪”，而苏联和我国学者如李慎明、吴恩远、徐天新、王立新等都认为苏共的“民主集中制”不仅有益于民主革命，而且对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苏共之所以瓦解，就在于苏共领导人抛弃了民主集中制。

4. 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未来命运

苏东剧变以来，西方学者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制度提出了种种责难，客观上也促使各国共产党对其进行反思，并对它们做了相应的调整，如俄共、日共和法共等不再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提法，转而实行“民主的运转原则”。不难看出，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在原苏东地区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那里有被淡化乃至取消的趋向。